

与朱熹同行：打开武夷山的另一种方式

本报记者顾钱江、郑良、王成

南国春早。春分时节，福建南平武夷山区万木滋长，百花竞放，走在五夫镇的潭溪旁，不禁想起镇上一位老居民的诗句：“胜日寻芳泗水滨，无边光景一时新。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

这位老居民就是理学大师朱熹，被后人尊称为“朱子”。

《春日》诗中的泗水，当在孔孟之乡的山东。而朱熹生活在南宋的福建，其时，北方是被金人占领的沦陷区，他是不可能到山东的。一个合理的解释是，朱熹徜徉于武夷山水之间，触景生情，联想到孔门教化之力，恰似春风触处万紫千红。今人走在武夷山区，会惊奇地发现，这首哲理诗中的景象，与眼前的满目春光何其相似，顿生与 800 多年前朱子相沟通之感。

武夷山是地球同纬度生态保护最好、生物多样性最丰富之地，这里的丹山碧水引得人们慕名而来。但，武夷山不仅是秀甲东南的自然名山，亦是孕育影响远播的新儒学的文化高峰。199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武夷山自然和文化双遗产，一个重要依据是，这里为理学的摇篮。

是的，武夷山还有另一种打开方式——与朱熹同行的文化之旅。

遇见朱熹

今天，很多人知道朱熹的名字，恐怕是因课本上的诗选。《春日》之外，另一首《观书有感》中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”的诗句，同样脍炙人口。

不过，诗人朱熹，影响远不及哲人朱子。人们公认，朱熹理学继往开来，实现了儒学的复兴。

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，但在历史长河中也曾经历低谷。两晋以后至唐朝，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影响不断扩大，虽说儒释道三足鼎立，但儒家渐成最弱的一足。唐代的韩愈在《原道》中发出复古崇儒、攘斥佛老的呐喊，但直到南宋朱熹才真正完成儒家的复兴。宋朝受外族侵略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，自古地处边缘之地的福建迎来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时代，因缘际会，朱熹在闽北创立了理学——偶然之中，有着大历史的必然。

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张建光指出，朱子理学回应了那个时代价值理想、外来文化、理论转型的挑战，以儒家为根本，吸收道、佛思想营养，集中国文化之大成，构建了以“理”为核心，涵盖自然、社会与人类思维的新儒家学术思想体系。

历史学家钱穆评价，在中国历史上，前古有孔子，近古有朱子。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，开创儒学，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。北宋理学兴起，乃儒学之重光。自有朱子，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，乃重获生机，发挥新精神，直迄于今。

朱熹创立理学，这一深远影响中国思想和历史的大事件，就发生在武夷山。学者蔡尚思讲，“东周出孔丘，南宋有朱熹；中国古文化，泰山与武夷。”

斯人已逝，而山水依然，遗存尚在。武夷山水之间，遍布朱熹的踪迹。

朱熹祖籍徽州婺源。其父朱松，举家南迁入



游客走进福建武夷山朱熹园参观(3月21日摄)。新华社记者姜克摄

闽，先后到政和、尤溪做县尉。朱熹 1130 年生于尤溪，14 岁那年父亲去世，朱熹受父亲遗命同母亲来到武夷山五夫里（今南平武夷山市五夫镇）居住，在此求学、成家、讲学、著述，“琴书五十载”。1192 年，朱熹离开五夫定居建阳（今南平建阳区），8 年后辞世，葬于建阳黄坑大林谷，享年 70 岁。

福建省文物局编纂的《朱子福建史迹图集》总结，朱熹出生、成长、终老于福建，求师问学、居处著述、授徒讲学、为官从政、访游出行，也绝大部分时间在闽，他所创立的理学被称为“闽学”，福建也因此得名“海滨邹鲁”，成为仅次于孔孟之乡的儒学重地。

武夷山的五夫镇，是朱熹从师就学 40 余年的地方，至今古韵悠悠。人在行驶的车上，远远看到一位巨人走来，那是今人所立的雕像：朱熹手持书卷，低眉沉思，右颊上有标志性的七颗痣，身后是层层叠叠的书册，表明朱子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博学、著述最多的人之一。

五夫古镇大体保持着南宋以来的格局。潭溪之畔、屏山之麓的紫阳楼，是朱熹住了近 50 年的旧居，不远处一株古樟，传为朱熹所手植。兴贤古街，是朱子文化遗存最集中的地方，一条狭窄的古巷，地面全用鹅卵石铺成，两侧为黄泥夯实的民房土墙，当年朱熹携徒探友，讲学问道，每次外出都要经过这里，因此被称为“朱子巷”。

漫步古镇，朱熹的身影仿佛眼前。

这是一个忧国忧民的朱子。担当是儒家的真精神，朱熹不仅有“国以民为本，社稷亦为民而立”的民本理论，更有身体力行的爱民实践，他亲手创办的“社仓”就在五夫：农民在青黄不接和受灾时，以低息或无息向社仓借贷粮食，秋冬收割缴还。朱熹之前，社仓是官办的，往往设在州县，而民办的五夫社仓建在乡镇，这一做法，得到朝廷肯定并向全国推广。

这是一个授业解惑的朱子。五夫镇上的兴贤书院，为朱子年少求学和学成后授课的地方，书院大门上方的造型，是状元、榜眼和探花三顶乌纱帽，寓意儒家求取功名乃是为了做一番治国平天下的事业。大厅高悬仿朱熹笔体的匾额

“继往开来”，这则耳熟能详的成语来自朱熹的话“继往圣，开来学”。

这是一个看重家庭的朱子。兴贤古街上有刘氏家祠。祠堂制度是朱熹设计的，此前，老百姓是没有祠堂的，只能“路祭”先人，朱熹规制了祠堂的建构，使祠堂进入了民间生活。朱熹所撰的《家礼》，简化并整理了“礼”的环节，结束了“礼不下庶人”的传统，使得百姓也可以讲礼了。《朱子家训》是中国家庭教育的经典，“有德者，年虽下于我，我必尊之；不肖者，年虽高于我，我必远之”等忠告，今日听来仍充满智慧。甚至，父母教子常用的“要讲理”一语，也打着理学的烙印，只不过，人们“日用而不知”罢了。

这是一个温情体贴的朱子。在五夫，朱子的诗词名句随处可见，政府部门食堂前的一块石上，就刻着这样几行字：“葱汤麦饭两相宜，葱补丹田麦疗饥。莫道此中滋味薄，前村还有未炊时。”小诗背后有个感人故事，朱熹某日跑去看女儿，女儿既欢喜又犯愁——“家贫市远无兼味”，只好煮一碗麦饭，用香葱做点清汤。端上葱汤麦饭，女儿愧对欲泪，朱熹遂写下这首《乐道葱汤麦饭》安慰。一位讲理又有情的慈父，是今天鲜为人知的朱子形象。

……

游历五夫丰富的人文景观，也是在阅读理学这本大书，认识一个立体的朱子。

和朱子同游

到了武夷山，九曲溪漂流必不可少。游客坐在竹排上启程，耳畔响起排工唱的船歌：“武夷山上有仙灵，山下寒流曲曲清。欲识个中奇绝处，棹歌闲听两三声……”

这是朱熹所作“武夷棹歌”十首中的第一首。由一曲而至九曲，观山览水之间，泛舟优游的人们不仅能听到，还会看到石壁上朱熹亲笔题刻的棹歌。武夷棹歌的全称为《淳熙甲辰春精舍闲居戏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诸同游相与一笑》，是 50 多岁的朱熹到武夷山九曲溪

畔创武夷精舍后，写的轻松小品，想象力丰富，亦不乏理趣。

换个角度看，对今天的游人来说，武夷棹歌是一篇绝妙的导游词，也提供了理解朱熹其人的线索。

“三曲君看架壑船，不知停棹几何年”，棹歌提及的“架壑船”是一种古代葬具，其状如船，置于峭壁之上的岩隙间。讲求格物致知的朱熹指出，这是上古崖葬的遗物，而非传说中仙人得道弃下的木舟。事实上，朱子理学被认为极具科学精神，如科学史学者胡道静认为，朱子对于自然界林林总总的万物之理，亦潜心考察，沉思索解，常有独到之见，能符合科学研究所得出的法则。

九曲溪沿岸题刻众多，朱熹所题既有流连山水的棹歌，也有意味深长的哲理之言。六曲溪南响声岩上，朱熹所写“逝者如斯”格外醒目。这四字源于《论语》——“子在川上曰：‘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’”响声岩上这方题刻用意为何？朱熹解释说：“天地之化，往者过，来者续，无一息之停，乃道体之本然也。然其可指而易见者，莫如川流。故于此发以示人，欲学者时时省察，而无毫发之间断也。”

原来，朱熹将“逝者如斯”题刻置于九曲溪上，为的是让观者在这一情境下更好地体会四字理学的深意。南京大学教授程章钊指出，理学家朱熹十分重视石刻，把它从一种文献载体转变为一种文化传播平台，石刻镌刻也从具体场合的纪念与记忆工程，转变为跨越时空的思想文化传承的符号。

九曲溪畔、隐屏峰下的朱子园，是 1183 年朱熹创建的武夷精舍旧址，此地对理学而言有特殊重要的意义。朱熹在此讲学 8 年，写成一系列著作，特别是修订完成并付诸刊刻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标志着朱子文化集大成的理学体系的成熟。朱熹整理的“四书”，在他身后成为元明清开科取士的标准典籍。

朱熹的一生，为官不到 10 年，立朝仅 46 日，大部分时间从事著述和讲学。他直接创建了四所书院，在闽北地区存留有武夷精舍，还有他晚年移居建阳创立的考亭书院。张建光说，朱熹既重视官办教育，更钟情书院教育，中国书院教育制度的真正确立是在朱熹手上。他制定的“白鹿洞书院揭示”成为后世书院学规的主脑。“揭示”的内容集自儒家经典语句，朱熹虽述而不作，但编辑上独具匠心和深意，如，以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作为“为学之序”，以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”为“接物之要”。

在武夷山踏访朱熹的遗迹，你会感到，行路亦是读书。朱熹人生中大半岁月安身立命、著述讲学于武夷山，这里的山水人文不仅启迪了他，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朱子思想的生动镜像。一条古巷，一座书院，一方题刻，一株古树，一只鱼灯……都可能是朱子理学这本大书中的一个活页。如果有“哲学地理学”的说法，那么，武夷山是一个重要的地标。

偕朱熹前行

对当代中国人来说，理解朱熹及其思想，要走进武夷山这个历史现场，更要返回当下，思考现实与未来。或许有以下三个维度：

一是融合。朱熹“武夷棹歌”“逝者如斯”等题刻，让人在游历中体味文化，循此思路，我们该如何将旅游与文化更深入更自然地融合起来？武夷山当地，正在进行着很多这样的探索，比如，用生态银行理念把五夫镇的烤烟房变为网红民宿；万亩荷塘之畔，年轻人以朱子婚礼的仪式喜结连理。

二是融入。朱熹“讲理”，也十分重视“讲礼”，努力把大道理化为新民俗，或融入日常生活规范中，家礼、家训、祠堂都是生动的例证。“君子教人有序，先传以小者近者，后传以大者远者”，朱熹就教育如何落实、落细、落地，有深入的思考和具体的实践，对今天无论是国家制定立德树人的教育政策，还是家庭有效地教育子女、缓解焦虑，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
三是融通。学者认为，朱熹的文化实践可归结为一句话，就是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创新，体现了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。今天的中国，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与重光，面临同样的文化课题：如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？朱熹的实践也提供了有益的启迪。

朱熹晚年陷于争议和政治攻击中，其思想被斥为“伪学”，身后才得平反，理学受到朝廷的重视，广泛传播开来。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，朱子理学是治国理政的官方哲学，是读书人修身济世的信条，是老百姓的日常规范，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其中，由朱熹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等观念发展出的礼教，对人性的禁锢和损害也是客观的事实。

这就有一个如何看待朱熹及其理学的问题，张建光给出的答案是“扬弃”。“朱子是儒学集大成者，朱子文化既创新发展了孔孟思想，同时也批判性地吸收了佛、道文化的合理因素。”他说，“在当代，我们也应保持扬弃的基本态度，把朱子文化精华与时代精神相结合，实现朱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”

在真实世界，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发展，使得当代中国人更易受到西方思想和大众流行文化的影响，与传统文化却较为疏离。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，恐怕首先要全面而准确地了解传统文化，才能辨别其中的精华与糟粕，进而在守正中加以创新。有意思的是，朱熹在谈到读书法时也有类似主张：“看前人文字，未得其意，使容易立说，殊害事”，应该“虚心静看”，“不执己见”，真正理解了作者的本意与逻辑之后，再作打算。

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朱子理学是绕不过的高峰。但是，对今人来说，朱熹不是用来膜拜与迷信的，而是视其为一位思想者，可以进行深入的对话，使我们面对当下和走向未来时，得到智慧的启发。

武夷山水是一个有效的媒介：让本来冲着丹山碧水岩茶而来的人们，得以邂逅朱子，在山水田园古镇的生动情境中，经历朱子之乐，体会朱子之理，认识朱子其人。对身陷信息泥潭和注意力焦虑的现代人来说，以此种方式来走进古代经典，实在是更直接，更具体，也更活泼。

如果山水曾吸引你来过武夷山，那么，同样奇峰竞秀的朱子文化值得你再来一次。

马斗全

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敦煌，我在上世纪 90 年代曾到过。那是往兰州参加一个诗歌研讨会，太原到兰州没有航班，我是坐火车大老远绕道西安转兰州的。会后和诗坛名家李汝伦、雷抒雁等先生一行十多人，结伴游河西走廊，西行直至阳关。那时从兰州到嘉峪关的公路，还是以前的旧路，不但车速很慢，有的路段还很难行车，有时只好从石滩流水中慢慢开过，不免有行路难之感。往阳关就连路也没有了，只有沙滩上凌乱的车辙印。我们自知难以找到阳关，只好在当地求援，找到一位女士为我们带路。虽说有当地人当向导，但还是走错了路。我们顺着汽车轮痕开出几十里后，方知走错了，只好返回重新找路。这样的经历让人至今难忘。因此也就更容易使人联想到古人西出阳关之艰难和阳关以西之荒凉。难怪王维诗云：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

我们那次因道路原因，只到阳关遗址一观，还算不上“西出阳关”。

去年秋天再访敦煌，那里已有了敦煌莫高国际机场，开通多条航线。敦煌到兰州，不但有了高速公路，而且有兰新高速铁路直通兰州和乌鲁木齐。各地去敦煌已甚为方便。上次没能到的玉门关，这次轻易就到了。玉门关在敦煌和阳关西北，新修的通往玉门关柏油路，大大缩短了戈壁滩上的行车时间。所以我写下诗句：“今不道龙沙远，西出阳关有故人。”上句说这里的交通条件已大为改观，往来方便，下句是说同敦煌当地诗友交流。

因历史意义而产生许多好诗的阳关，反过来又因好诗而更广为人知，真所谓相得益彰。自古以来，许多地方因诗而名著于世，其中可以与阳关玉门关相比的，似乎只有河东“欲穷千里



目，更上一层楼”的鹳雀楼。所以敦煌方面在推动社会进步和搞好旅游业的同时，着意发展诗词事业，自然是一项有远见的决策。阳关玉门关赋咏者，除了“西出阳关”的内地诗人，还应有本地诗人。敦煌市诗词学会和拾风诗社的先后建立，标志着敦煌已组建起自己的诗人队伍。

后来发现拙句“西出阳关有故人”，竟与宋代诗人范成大的“西出阳关有旧知”意近，更与李公麟句全同，可谓巧合。那就算是借用古人

句吧。古人诗词中用到“西出阳关”或“西去阳关”之类语的很多，如苏辙的“西出阳关万里行”、梵琦的“西出阳关九千里”等。苏轼写到“阳关”二字的诗词，更有十几首之多。以至当代，仍不乏“西出阳关”之作，如顾随的“西出阳关望迷眼”、蔡淑萍的“西出阳关十七年”等。说明“西出阳关”已是一个饱含深意且经久不衰的诗词用语。

古诗中的“西出阳关”，主要是就为保

卫祖国疆土、开发和建设西北而勇敢西去的内地人而言。有许多人去后便没能回来，战死或老死于荒凉的西北大漠。所以，“西出阳关”已不仅仅是凄美的诗文字句，更是一种悲壮的历史记录。唐代著名诗人王翰“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”之句、戴叔伦“愿得此身长报国，何须生入玉门关”之句，读来令人感泣。正是感于此，我的《阳关古道》诗为：“野草年年送马蹄，秋风不与记凄凄。唯留

千古英雄气，一路遥遥直向西。”

只有到了这片英勇悲壮之地，才能有诗以外的切身体感。此次初到玉门关外的当代诗人李云桦，伫立茫茫戈壁荒原，对着汉唐所遗关垒，望着经两千年风雨已残缺不全的夯土长城，想着古来西出阳关的先民们是怎样艰难困苦、牺牲惨重，禁不住潸然泪下。友人拾风诗社社长陈竹松见状，即刻过去抱着李云桦，本欲安慰他，没想到自己也哭了。那场景，教人至今想起来仍忍不住落泪。

由此可见，“西出阳关”，既是众多先贤可歌可泣的行为和经历，更是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顽强意志和献身精神的表现。

我们所处的时代，仍然需要古人这种精神。当年纷纷去支援西北建设的人，后来陆续自愿献身西北建设的人，都属“西出阳关”者，都同样令人敬重。这样的人如今仍很多。除了上文提到的顾随、蔡淑萍等，又如为敦煌诗词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陈竹松，即是自愿从湖北来这里工作的年轻人。甘肃诗词名家又兼擅书画印的萧雨涵，也非甘肃人，而为重庆人。阳关西更西的新疆乌鲁木齐，名著诗词界的于钟珩、王星汉、邓世广几位老诗人，均在那里工作生活几十年了，其实也都为内地人。

我的“西出阳关有故人”，除敦煌拾风诗社的诗友外，自然还包括阳关以外以至新疆的许多诗友。

所以，以后，我还要再到敦煌，西出阳关，携春风而度玉门关。多去那里一次，便会多一份震撼和感动。同时，希望能尽量为敦煌的诗词发展做一点贡献，并争取多为阳关玉门关奉献几首可读之作。

题图：无人机拍摄的阳关烽燧遗址和盛开的桃花(2019年4月18日摄)。

新华社记者马宁摄